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3/86
8 Februar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10,12,22,24和27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
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
和歧视宣言》的执行情况

儿童权利

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1993年1月29日致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的信

兹有幸转交有关前南斯拉夫领土内塞尔维亚族儿童、女童和妇女遭强奸情况的资料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就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穆斯林妇女遭强奸的决议所作的声明。

故望你处将本文件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10、12、22、24、27下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大使、临时代办
弗拉迪米尔·帕维切维奇博士
(签名)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就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
南斯拉夫境内穆斯林妇女遭强奸的决议所作的声明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审查了欧洲议会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穆斯林妇女遭强奸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穆斯林妇女遭到拘留和强奸的情况。同时，该决议完全忽视了针对该地区塞尔维亚族和其他族妇女所犯的类似罪行；也未对此进行谴责。到目前为止收到的资料和逃离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的受害者的陈述已可供联邦政府使用并将被寄送欧洲议会。这些资料已作为正式文件送往联合国各机构。

联邦政府认为，此类罪行应受到最强烈地谴责，无论罪行在何地发生，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应受惩罚。我们认为在战区虐待妇女的行为，无论将它作为“种族净化”的战略，还是为了其他目的，都是一种非人道行为和罪行，不仅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而且也不符合道德、诚实和尊严的基本概念。

联邦政府反对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采取的片面说法，不充分审查这种指控，不事先进行调查或收集数据，便在决议中把这种虐待行为完全归罪于塞尔维亚族人。

正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赞成早日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实及收集必要的的数据，审判和惩罚犯下此类罪行的人。我们坚决相信，如能基于可信资料，此类调查也将有助于消除欧洲议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强奸妇女罪行的施行者和受害者属哪个民族所持的偏执和未经证实的疑问。

联邦政府认为，由于此类犯罪的可能性，由于犯罪作为战争宣传的明显作用，需要关注，作出及时反应。联邦政府强调准备参加这类调查并从自己的消息来源提供这类罪行的证据。

贝尔格莱德，1993年1月8日

非正式翻译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联邦议会

贝尔格莱德, 1992年12月30日

Egon Alfred Klepsch主席
欧洲议会

主席先生:

我们通过南斯拉夫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收到了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境内妇女遭强奸的决议。

我们注意到, 决议的某些段落, 尤其是某些指控是建立在错误资料基础上的, 因而可能导致错误的、有害的、危险的结论。

我们认为欧洲议会长期以来一直完全依赖一种消息来源, 造成它对南斯拉夫危机采取一种片面的和偏袒的方法并进而作出这一决议。

该决议的序言部分第B、C和D段及执行部分第1段是歪曲事实最明显的例子, 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强奸穆斯林妇女的战争罪行完全归咎于塞尔维亚民兵。然而, 众所周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内战中的三方都犯有强奸这一战争罪行。因此, 排除另外两方, 坚持责任只在一方, 会减轻前者罪行或为他们找到借口。最引人注目的是序言部分第C段指控塞尔维亚族民兵在妓院中关押了大批妇女, 而事实上这种有组织的罪行几乎完全是穆斯林民兵犯下的; 他们建立妓院, 对妇女进行性虐待, 而被承认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当局则充分认识了解到这一情况(例如, 萨拉热窝和图兹拉的妓院)。

我们对决议中提到的资料的虚假和不确切性表示强烈不满, 并希望提请注意它对真相及和平事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联邦议会持有一些资料, 如果被使用, 那么已通过的决议本可以较为公正。因此, 这些资料应交给欧洲议会成员国, 在需要时供它们使用。

我们认为, 如果欧洲议会能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或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能派一个代表团访问斯特拉斯堡, 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事实, 一起努力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冲突, 以便最迅速、最有效地结束

波--黑内战中犯下的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战争罪行。
望早日得到你对此给予的答复。

此 致

敬 礼

主席: Milos Radulovic
代表共和院(签名)

主席: Jugoslav Kostic
代表公民院(签名)

塞尔维亚医学联合会
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 1993年1月14日

塞尔维亚医生的抗议

我们代表塞尔维亚的医生对德国议会议员Stefan Schwartz先生关于“塞尔维亚医生对穆斯林妇女”进行活体内试验的荒谬指责表示强烈的抗议和厌恶。Schwartz先生在德国议会中和电视上作了发言,后来在德国报纸《Bild am Sonntag》及荷兰报纸《Haagache Courant》和《Folkskrant》上发表。他在发言中根据一人的证词指责尤其是对穆斯林妇女进行的罪恶试验。

此种指控的罪行和恐怖电影的情景相同,实际只凭一个身份不明的克罗地亚族女医生的证词。她说在解剖一位穆斯林妇女尸时发现该妇女流产后子宫内被植入狗的胚胎。这就证明了指控的荒谬及其罪恶意图。编造这一故事的目的显然是要把塞尔维亚族人和塞尔维亚族医生描绘成恶魔。这真是无休无止的神经病说法。

我们忆及塞尔维亚医学联合会及其道德委员会根据塞尔维亚医学的优良传统,一直支持和平,多次呼吁反对毁坏城市,屠戮人民,反对内部民族和宗教战争的所谓种族净化恐怖行为及其他兽行。它也一直坚持容忍和最高的人道主义原则。

在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逃往塞尔维亚的54万难民中,有3.4万穆斯林人,8000克罗地亚族人,4.3万其他人(犹太人、罗马尼亚族人、匈牙利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保加利亚族人和其他人)。他们同塞尔维亚难民一样得到免费治疗,享受其他的好处。

塞尔维亚医生要求保护他们的名誉,谴责不凭证据玷污他们、而还受惩罚的人。我们希望这些在自己国家散布这种无意义、荒唐指称的人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主席: Milan Popovic 医生
代表塞尔维亚医学联合会
道德委员会

院士、主席: Uojin Sulovic 医生
代表塞尔维亚医学联合会

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
罪行国家委员会

备 忘 录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扎克地区NOVI GRAD村中
强奸塞尔维亚族儿童、女童和妇女的罪行

SAMAC

1992年12月24日

战争罪行和灭绝
种族罪行国家委员会
研究员编写

备 忘 录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扎克地区NOVI GRAD村中
强奸塞尔维亚族儿童、女童和妇女的罪行

本备忘录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收集到和得到证实的关于克罗地亚占领部队人员自1992年5月8日到7月15日在Novi Grad村强奸塞尔维亚族儿童、女童和妇女罪行的资料。在Bosanska Posavina地区的Donja Dubica、Trnjak、Struke、Novi Grad、Gnionica 塞族村落以及奥扎克的Gornji Svilaj塞族人住区中克罗地亚占领部队对塞族人犯下许多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罪行。本备忘录只是有关这些罪行的全面档案的一部分。

1992年4月19日，Bosanska Posavina的这些村庄的塞族人遭受到战火的灾难。这天，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国民卫队跨越Sava河，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奥扎克地区的克罗地亚民主联合会成员的支持下，开始从事犯罪活动，杀害了Struke村的塞族议员Rajko (Dusan议员)和Donja Dubica村的塞族民主党主席Djuric。

塞族村庄 Donja Dubica 和Trnjak的村民遭到这些部队的包围之后被迫逃离家园，大批难民来到最大的塞族人村落Novi Grad。这一地区的塞族人建立了共同防御组织，防止再次象1944年12月7日和8日那样成为灭绝种族的对象。让我们提醒一下，在那两天中Pavelic的人马屠杀了Trnjak和Dubica村的所有村民。有713名男女儿童被杀，就因为他们是塞尔维亚族人。现在，几乎半个世纪后，新法西斯主义又给这里的塞族人带来新的苦难。16个敌意的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村庄，包括奥扎克在内，包围了这些塞族村民。村民们一天二十小时受到来自另一国家--克罗地亚共和国--特别是来自Sava河对岸Jaruga村的炮火袭击，伤亡惨重，房屋被毁，许多伤员因缺少药品和医疗死亡。这一地区塞族人的悲惨情况已屡次通知给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保护部队，但它们从未提供任何救助，甚至未作出任何反应。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占领军保证说，如防卫人员停止抵抗，他们就让所有村民过河去自由的塞尔维亚领土。塞族人相信了他们，接受了这一条件，但是，没有得到自由。1992年5月8日，所有村民都被关进了奥扎克的“Strolit”拘留营和小学校舍。以后的十天中，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成批地送回村庄。事实证明，Ustashi当局这一有意识行为不仅给妇女、而且给儿童带来悲惨的命运。

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名为“Vatreni konji”(火马)的特别单位对塞族公民犯下无数罪行，除了破坏和烧毁奥扎克地区塞族村庄的房屋和教堂外，还在Novi

Grad村强奸大批女童、少女和妇女,同时还对村民施行殴打、虐待和侮辱。这种罪行是不会被遗忘的。这群疯狂的Ustashi匪徒知道所有男子都被关在奥扎克区的营地,毫无抵抗能力,因此狂欢作乐,一直持续到1992年7月15日,也即这一地区被Srpska共和国部队解放的那天。许多例子都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变态和大克罗地亚情绪。

这一特别单位就编制而言属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第102旅。1992年6月,他们把16个妇女和儿童关在Djakovic(Branka)Mile的房屋中,然后放火,这些妇女和儿童在最后一刻跳窗才幸免于难。

他们在Vrbovacki Lipik捆住Topic Milan(父名Ljubo)和他的妻子Topic Nada,指控他们拥有武器,还在他们四周堆上草点火,胁迫他们承认拥有武器。等到火焰开始烧身,他们才将这对夫妇带离,随后拷打Milan Topic,还强奸了他的妻子Nada。

克罗地亚恐怖主义分子杀人无数,其残忍和野蛮程度难以描述。尽管他们拥有足够武器,却习惯于用拷打或难以言状的酷刑将人折磨致死。Topic Mihajlo(父名Simo),绰号叫“Mijo”,1913年生于Urbovacki Lipik。1992年7月5日,他被Pecnik村的一名Ustashi分子Mato Barusic杀害。象在中世纪一样,Mato Barusic将雨点般的乱石砸到他的头和胸部上,直到死亡。人们死前要经历几天难以忍受的巨痛。妇女们也难逃此难。这名Ustashi分子还把Pakic Simka(父名Mijo)关在一间屋子中并将她活埋。Lesic Slavka(父名Jovan)于1962年生于Vrbovacki Lipik,1992年5月2日被一名来自Pecnik村的Ustashi分子Tado杀害。Tado甚至当着拘留营中关押塞族人夸耀这次杀人,说他的狙击枪从未错过一名Chetnik(塞族突击队员)。

Novi Grad的一名老年妇女Zoranouic Zorka(父名Peter),1913年生,在家中被Potop村的一名以前是她邻居的Ustashi分子无缘无故杀害。

Tudjman的“骑士”到处强奸,当妇女被拘留在奥扎克地区的拘留营中时,这些“骑士”除了强奸之外还引用了一种特别方式侮辱妇女。这些Ustashi搞一种所谓的“营中婚礼”,找相貌、年龄、身高、教育水平等方面差距特大的俘虏进行性交。发明这种恐怖性侮辱的人是拘留营副看守Josip Tolic,即奥扎克地区Bele Bare人Ruza的儿子。第一次试验找到Gradacac的一名学校教师和另一名囚人,两人

• 这一Ustashi罪犯的身份正在调查中。

都是塞族，被强迫在枪口下当着Ustashi分子性交。第一个“婚夜”还伴有音乐，由一名拘留营的囚人弹吉他。

另一个例子是强迫拘留营一些塞族未成年囚人去强奸Novi Grad的一名精神错乱的塞族女童。他们因拒绝而遭到毒打。Ustashi分子向其他饥饿、憔悴的囚人提出条件，说如果他们自愿强奸这名女孩就给他们一顿饱饭。

绝望的母亲和祖母对不断发生的强奸罪行多次向Novi Grad的Ustashi公安部门提出申诉，Ustashi当局命令所有妇女和女童住进警察局附近的两间房屋中，解释说这样她们便可“得到保护，不受克罗地亚极端分子的伤害”。大多数妇女相信了，结果大错，因为她们聚集在一起后更易成为Ustashi分子兽行的对象。Ustashi分子可以不受阻碍地成群闯入这些房屋，带走他们选的妇女，以最粗暴的方式将女孩子从哭泣的母亲手臂中夺走。

他们肆无忌惮，Ninkvic Jovanka(父名Drago)的例子便是证明。他们把一块燃烧的破布放在她手掌上，逼她说出把女儿藏在什么地方了，但她忍受了这一可怕痛苦，救了自己的孩子。

根据到目前为止对Novi Grad这种罪行的调查，共有26名9岁到60岁的妇女遭强奸。除个别情况，大多数遭到轮奸，强奸者多达8人。

强奸罪受害者的真实证词已交Srpska共和国当局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罪行国家委员会存案。由于这些是敏感的、使人深受创伤的个人经历，为保护人格完整，我们只提供基本事实，描述她们所经历的巨大磨难，作证的受害者的姓名则用缩写。毫无疑问，这场战争中最具悲惨的受害者是儿童，因此我们就从这一例子开始。

• 强奸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摧残了人类的繁殖，造成的创伤伴随终身。许多因素使我们很难确定大规模强奸罪的真象。

首先，许多妇女说，她们要等到家人从克罗地亚拘留营释放，她们才出面作证，因她们有理由为家人生命担心。

其次，受害者来自家长管辖的家庭，尽管人格得到保证，她们还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愿详细回顾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再次，一些妇女在这一地区解放后立即离开，寄居塞尔维亚或国外亲属住处，要等她们返回才可能听取她们的证词。所以，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这一罪行的受害者。在未来很长时期内，这将对国内外人道主义组织和机构的良心考验。

SM年龄9岁8个月,于1992年7月5日被强奸。罪犯是Pecnik村的Mato Barukcic。

证人 Radulovic D. Danica 谈到了这件罪行:“1992年7月5日, Pecnik村的Ustashi分子Mato Barukcic走进屋里。他开始揍我,摸我女孩的腿,说她如何如何漂亮。他拿枪指着我,把刀顶在我的喉咙上,掠走了我的饭自己拿去吃。他叫我去掩埋被他杀害的祖父Mihajlo Topic(79岁),还说是别人杀的。实际上是他用石头砸死了老人。我不想去,他便对我拳脚相加,恶语中伤,还诅咒我们的塞族母亲。他要將小SM带出屋子,我不让。他硬是把她从我身边抢走,带入一里外的森林。我扯破喉咙呼喊救命。过一会儿,Radulovic T.Sretko来了。我告诉他孩子让Ustashi分子带到森林去了。一名警察、Joze Jurisic的儿子和Pera Vranic的儿子不敢单独去追孩子,便又叫来了另外三名警察。过了一会,孩子被带了回来,满脸是泪,衣服不整。”

证人Radulovic T.Sretko还叙述了同一罪行的下述情况:“1992年7月5日,我听到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叫,便冲出了自己的屋子。我看见一名Ustashi分子正穿过我的土豆地、带着9岁的LSM去森林。我喊住两名士兵,他们叫来警察。两名警察进入森林,又出来说未发现任何人。然后两人再进森林,才发现草被踩的痕迹,再发现罪犯和孩子。我听到了枪响,随后罪犯和孩子被带出了森林。”

15岁的受害者OPS的证词中有下面的话:“1992年7月3日23点,一伙Ustashi分子乘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来到Drogo Vladic房前。当时房里有15名妇女和儿童。他们8人手持武器、电筒,全部进入房中,用棍子打屋里每个人。他们要我出去,我不去;我妈紧抱着我,他们硬是把我从妈妈怀中拽走。妈妈求他们别把我带走,对他们说:“我也是克罗地亚族人”。但他们打了妈妈,然后把我带走。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女孩ALV带到Posavska Mahala,把我带进Mate Brnic的房中,把ALV带入附近的森林,Marjan Brnic和ALV留在一起。随后我在房中也被Marjan Brnic强奸,Ilija Brnic在旁看门。在Ilija Brnic进房也要强奸我时,警察来了,把我们带到Noui Grad的警察局。他们随后也将ALV和Marjan Brnic带来。不久,Ilija的一个亲属身着制服,全副武装来到警察局,威胁说,如果警察不放人,Posavska Mahala全村人就会来砸烂警察局。警察只好释放这两人,递还了武器,而我和ALV也被警察长开车送回家中。在关于另一次遭到强奸的证词中她说:“1992年7月12日20点,两名Ustashi分子来到Panta Tadic房前,命令我们(约30名妇女和儿童)在院中排成一列。同时,另一名Ustashi武装分子守在门口。他们强迫我和LAT进入一辆轿车,带我们进入Novo Selo的一间屋子。我在那里被一名叫“Cutura”的Ustashi分子强奸。随后又有15名Ustashi分子进来。又有三名Ustashi分子强奸了我,其中有一名叫“Patak”。约在

21点,Ustashi分子Marko和Ilija把我带回家中。”

BPM, 17岁,在证词中说,“1992年7月13日和14日之间夜里,Ustashi分子把我们带往Bosanski Brod的一个拘留营,这是一间材料仓库。他们在那里把年长的和年青的妇女各自分开。我、MDjJ、NTB、ZGA、BMJ和BDM被隔离关在一间房中。同日,Jurica Bozic进入房间,把我带入隔壁房中强奸。几天后,Anto Goluboric又同样在附近一间屋子里强奸了我。Topolovac Simo在他停在炼油厂附近的车中强奸我。Tolic Josip象Anto Goluboric一样,在同一间屋子里强奸了我。Golubo Anrovic和Topolovac Simo后又多次强奸我。”

MDjJ,21岁,作证说:“所有Novi Grad的妇女和女孩从奥扎克的拘留营回来后都回到家中。但她们,尤其是年青妇女和女童的灾难和折磨正在此刻开始。约25名妇女和女童被关入Mile Djakovic的房中。我的痛苦经历是1992年7月10日开始的。当时,I、NTB和BJM被奥扎克的拘留营看守Anto Golabovic和他的助手Josip Tolic和Jarica Bozic强行带往Bosanski Brod。他们向我们保证提供保护,不让我们遭极端分子的虐待。我的朋友被强行带出拘留营(NTB被Josip Tolic带走,其他人被Ustashi在得到Anto和Josip允许下的人带走),而我直到1992年8月8日之前一直得到这名监狱看守的保护。8月这天他威胁和讹诈我,要我和他发生性关系,不然就报复我哥哥和父亲。他在一个朋友的宿舍中强奸了我。1992年8月18日,我哥哥和一位表兄来到营地把我换了出去。”

SNM, 42岁,作证说:“1992年6月4日约1点30分,两辆轿车停在Mira Brocilovic的房前,那里躲藏着14名妇女和儿童。他们开始射击,然后咒骂我们,说我们窝藏Chernik(塞族突击队员),要我们出屋。此后,他们让我们排成一队,强迫我们四个人--我、TDjN、PSD、TLLj--进入一辆轿车,带往Posavska Mahala附近一间屋子放马房阁楼,在那里用刀子威胁我。五名Ustashi轮奸了我。他们的名字是:Brnjic Marjan、Barukcic Jozo、Glauas Ilija、Glavas Pavao和Barukcic Martin。约5点30分,他们将我们赶进森林,还在后面开枪射击。”

LTA,26岁,作证说:“1992年7月12日约20点,三名Ustashi分子进房,那里藏有大约15名妇女。他们穿制服,全副武装,别着花格旗徽章。他们强迫我们出屋,在院中排成一列。他们把我和OPS推进一辆轿车带往Novo Selo。我们离开时,一个名叫“Patak”的Ustashi分子向四周房屋的窗子扫射。我们被分开关押。一个名叫“Cutura”的Ustashi分子进屋,带着避孕药。这个叫“Gutara”的Ustashi分子进屋后强奸我,随后Novo Selo的Niko也强奸了我。后来又有六名Ustashi分子进来,他们戴着头盔,浑身肮脏,象刚从战壕中来。六个人全都强奸了我。早晨约8点钟,我们

被送回家。”

TLLj, 37岁, 作证说: “1992年6月4、5日夜间12点30分, 两辆轿车停在Drago Ninkovic屋前。 五名Ustashi分子: Marjan Brnic、Ilija Glavas、Pero Glavas、Ilija Jaric和Jozo Barukcic进入屋中, 强迫我去Mira Broeilo的屋中, TDjM、SNM和PSD也被带入这间屋里。 然后把我们所有人带到了Povaska Mahala村, 他们强迫我们中的三人进入Mate Barbara的屋中, 强迫我进入Jela Glavas的屋中。 Martin Barukcic第一个进入我的屋, Marjan Brnic、Ilija Glavas、Pero Glavas、Ilija Jaric和Jozo Barukcic也随后进屋。 他们全都强奸了我。 早晨5点30分, 他们让我们步行回家, 还在后面开枪射击。”

PCD, 22岁, 作证说: “1992年6月4日或5日的1点30分, 两辆轿车停在Mila Broeilo房前, 屋里躲藏着5名妇女、两个男孩和其他4名儿童。 他们强迫我出屋, 咒骂我们的塞族母亲、指控我们窝藏Chetnik队员。 他们强迫我, TDjM、CNM和TLLj进入轿车, 沿一条去Posavska Mahala的森林中的路把我们带到了Mate Barbara的屋中。 我们被关在屋中。 Marjan Brnic先进入我的屋中, 强奸我并威胁要杀我。 随后Glavas Pavo(父名Ivo)、Glavas Ilija(父名Ivo)、Juric Ilija(父名Marko)、Barukcic Maro(父名Jurko)都强奸了我。 约在早晨5点30分, 他们将我们送出森林, 还在我们身后开枪射击。”

TDjM, 29岁, 作证说: “1992年6月4日和5日间, 两辆轿车停在Mira Brocilo房前, 5名Ustashi分子进入房中。 他们是: Marjan Brnic、Jozo Barukcic、Ilija Glavas、Pavo Glavas和Martin Barukcic。 Ilija Jaric也和他们在。 他们强迫我、CNM、PSD出屋, 把我们带到Posavska Mahala村的Mate Barbara的屋中关起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Marjan Brnic, 前面提到的其他人随后也进来了。 他们全都强奸了我。 他们打我、骂我、还诅咒我的塞族母亲。 早晨5点30分, 他们将我们赶出, 让我们回家, 还在我们身后开枪射击。”

RKB, 38岁, 作证说: “1992年6月7日约12点钟, 五名穿制服的Ustashi武装分子来到我的房前。 其中三人进入房中。 两人抢值钱的东西, 一人进入我所在的另一间屋子。 他用武器和刀子威胁我, 强奸我之外还强迫我做些下贱的动作。 这些罪犯的名字人人皆知, 因为他们还强奸过村中的其他妇女。”

KPV, 40岁, 作证说: “1992年6月30日16点, 五名穿制服的Ustashi武装分子来到了我的屋前。 两人留在屋中, 两人去隔壁, 其中有一名是Posavska Mahala村人Mate Tipara的儿子。 当时一名Ustashi分子强奸了我, 他是名叫“Uatreni Konji”的恶名昭著的Ustashi匪帮成员。 另两人去了Ljubisa Sisljagic屋中, 他们在那里强奸

了RPS。三、四天后,强奸我的那名Ustashi分子和另一人再次来到我的屋中。他们把我妈妈赶出屋,两人再一次强奸了我。”

JSM, 36岁,作证说:“1992年6月30日约13点30分,一辆黄色轿车载着4名穿制服的Ustashi武装分子开到房前,其中3人进屋,一人留在车中。他们自称是在寻找武器,威胁要杀我的孩子。屋中的3人把我拖上楼,轮流强奸了我。以后我得知其中两人来自Posavska Mahala,另外两人来自Donji Svilaj。他们和强奸村民的罪犯是一伙。”

JVJ, 50岁,作证说:“1992年6月3日,3名Ustashi分子表面上来寻找武器,把我们10个妇女、3个儿童关起来。他们把我带到Potoeanski Lipik的一间屋中,两名Ustashi分子在那里强奸了我。其中一人1970年出生。这之后,他们命我穿过森林回家。他们属于一个叫“Uatreni Konji”的团伙,是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的一部分。”

克罗地亚极端分子觉得大量强奸还不够,又对受害者使用了其他形式的侮辱。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位37岁的有孩子的母亲,1992年6月8日,Sicic Pavo(父名Ive)强奸她后,强迫她光天化日裸着身体在村中游街。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军队在这一地区被Srpska共和国的军队击败。他们1992年7月13日到15日撤出时,除带走拘留营关押的男人之外,还带走了大批塞族妇女和女童作为人质。这些男子被用来挖战壕,而且主要是在受炮火袭击时挖,因而许多人死亡或受重伤。他们虐待妇女和女童,以后又用她们交换被捕的克罗地亚士兵。

这些妇女和女童在被关押于Bosanski Brod拘留营,整段期间不断地遭到虐待和强奸。一名来自Derventa的教授,塞族人,利用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访问的机会塞给他们一张纸条告诉他们克罗地亚Ustashi分子在拘留营中藏有妇女和女童,给国际红十字会发现了,将她们列为交换对象。但这位尊敬的人因“透露Ustashi的秘密”被Ustashi分子当着所有拘留营囚人面前残忍地打死。这一罪行的施行者是奥扎克城的Golubovic Anfo(父名Marko)和来自奥扎克地区Bele村的Tolic Josip,他是Puza的儿子。

Novi Grad村的强奸犯留下了一份书面文件,证明了他们的罪行。这是Novi Grad安全服务处1992年6月15日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了1992年6月4日至5日一夜之间报道的9次强奸罪行。这些报告是受害者的母亲或受害者本人提出的。Ustashi当局根本未采取任何行动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因为这一特别罪行正是克罗地亚当局政策的一种手法。

在附件一,我们附上上述报告副本,原件存在战争罪行和灭绝种族罪行国家委员

会。

Ustashi分子在这一地区犯下了大量暴行，由于受到天主教意识和心理上的纵恿，教士可说也是帮凶。许多塞族人在设在Uovi Grad小学的拘留营的一个房间里遭受酷刑被害。在这间屋子的隔壁房间中找到了一本天主教祈祷书。这本圣书中夹有一张Pera Simic的名片，它下面那页的文字是：“主啊，回答谦卑地向你祈祷的人，原谅那些向你表示忏悔、乞求宽恕慈和的人的罪。主啊，给我们你的无限恩赐，解脱我们的罪，免除我们应受的惩罚。”

在Novi Grad村犯下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目前身份已确定的那些人的名字已列入本备忘录附件二。这些名字是根据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词收集的。关于其他塞族地区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和犯罪者的全面资料也正在收集。

奥扎克地区 Novi Grad 村

公安局

1992年6月15日

附件一

报 告

1992年6月5日至6日,自7点至7点。

- 10.10: 我们给高尔夫球车加了20升汽油,司机是 Cubel Mato。
 - 11点: 1992年6月4/5日,半夜后,1点30分,5名身份不明穿伪装制服的武装人员从 Posavska Mahala (自 G.Brezik)方向到来,从 Brocilovic Mira 屋中带走4名妇女,她们分别关在两个房间里,每间两人,受到许多人轮奸。该案由 Djekic Milica 报告,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1963年生于 Bosanski Brod 公社的 G·Klakar,住在 N.Grad。她说她遭5名男子轮奸,这一暴行造成她大量出血。当局出证明允许她去奥扎克区的医疗中心,而且让她返回。
 - 已出具证明对下面的人进行医疗检查:Krsic Bosiljka、Djekic Milica。
 - 11点30分:约有40名妇女和儿童聚集在 Novi Grad 的 S·J·S(公安局)门前,有些人在抽泣,有的则号啕大哭。她们说怕强奸、怕抢劫,不敢回家。将这事通知宪兵和奥扎克区警官之后,我们要求各人回家,至15点45分他们才散去家中。
 - 12点: Stje Panovic Anto, Sijekovac 人, 1930年11月17日出生在 Bosanski Brod 公社的 Korace, 身份证号码NO.87182, 1982年1月19日在 Bosanski Brod 颁发。他开车带着 Djurdjic Dobra 家中的一些物品从 Novi Grad 去 Sijekovac。
- 物品清单: 电冰箱一个、吹风机一台、钢壁橱一个、床单、陶器和一些金工车间工具。这些物品属他的女婿Djordjic Dobra。KDobra和妻子住在德国。
- 14点: 据报一已婚妇女失踪,1992年6月4日和5日夜间,她和另外三名妇女被从M ira Brocilovic 的屋中带走。失踪者是Zivko Stojanovic的配偶 stojanovic Duska。她的祖母Ruza Bogdanovic住在N.Grad,报告她失踪。

17点,Ruza报告说,Duska约在15点回到家中,说她已被强奸。

- 16点30分: Lezic Ljubica 在1992年6月4号至5号间的夜中被强奸,她被 Kopic Andrija 第一股的巡警带往奥扎克医疗中心,17点回到家。医疗检查结果存在奥扎克区的医生档案中。

军事警察Vanga Lvan在审讯Milica Djokic 时强奸了她。17点,他将她带到N.Grad。

- 18点30分: Krsic Bosiljka注意到一辆牌号N.MD295-12的深蓝色“Jugo”车停放在Bumbic Neda酒店附近。她即报告此事,说那辆车曾停在房子附近。她还说她认为车中就是一些强奸犯。巡警到时车已不知去向。
- 18点40分: Vrnnic Tadija 领导第一区巡警巡逻 Vrhovacki Lipik, 听 Grudelj Marjan 报称 P.Mahala 村的 Brica Marjan 用枪指着 Lipik 村民Mrsic Jelena,要她交出武器。他说自己有权进行这类调查。
- 18点45分: N·Grad 的Ribic Mara,1933年8月11日出生,报告说自己遭到强奸。四名着伪装制服的武装分子闯入她家中。他们先向她要武器,后又有一个将她从破楼中带出,抢走了她的两只耳环和一条金链子。接着他们又强奸了她。他们是坐一辆“Jugo 45”车来的。他们还从屋中抢走了 Djuka pavie的电视机、录相机桌和一只金耳环。
- 19点: 1992年6月5日19点30分, Zratic Mato, Grgic Stjepan, Kopic Andrija 和Antunovio组警队巡逻堆放垃圾的地区,发现两枚炸弹,一付防护面具和一套餐具。
- 22点40分: Dujak Anto 和Vanga Lvan与两名宪兵一同前来,说今晚来帮助我们,但夜间会离开。

Lovric Zoran未来上夜班。

Brkic

N Grad警察局副局长

附件二

强奸者名单,这些人所属的武装组织

下列在1992年5月至8月间是克罗地亚共和国正规部队军人,属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第102旅,在奥扎克地区领土上进行战斗时当小队队长。他们同时也是克罗地亚国际委员会名为“Vatreni Kinji”(火马)的特种部队人员,随同该部队对塞尔维亚族平民犯下战争罪行。他们在奥扎克地区破坏烧毁房屋及教堂,杀害和虐待拘留营囚人,强奸了众多塞族女童、少女和妇女,同时对她们施加殴打、虐待和侮辱。

1. GOLUBOVIC(父名Marko)ANTO,1969年10月4日生于Gradacac,住奥扎克M·Tita街152号,目前在Orasje战场。
2. AHMETOVIC(父名Hilme)IBRAHIM,别名“Ibe”,1958年8月8日生于奥扎克,住奥扎克城Mibe Miletica街11号,在逃。
3. PUDIC(父名Mate)ILIJA,1959年11月20日生于奥扎克,住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在逃。
4. JUSIC(父名Marko)ILIJA,1948年10月7日生于奥扎克,住奥扎克地区Potocani,在逃。
5. STAZIC(父名Jure)ANTO,1970年5月18日生于奥扎克,住奥扎克城Porobica街173号,在逃。
6. BAJUSIC(父名Stjepan)MARKO,1961年6月2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住Posavska Mahala,在逃。
7. HRNJKAS(父名Pave)MARKO,1964年1月1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rnjavor,住Prnjavor,在逃。
8. GLAVAS(父名Ive)PAVO,1951年12月7日生于奥扎克地区,住Posavska Mahala,在逃。
9. BARUKCIC(父名Martin)JOZO,1961年3月1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住Posavska Mahala,在逃。
10. CALVSIC(父名Mate)MARIJAN,1967年6月17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tocani,住Potocani,在逃。
11. BRNJIC(父名Mate)MARIJAN,1966年6月15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住Posavska Mahala,在逃。
12. CALVSIC(父名Mate)JURO,1964年3月13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tocani,住

Potocani, 在逃。

13. CALUSIC(父名Jure)MATO, 1935年2月24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tocani, 住Potocani, 在逃。

14. GLAVAS(父名Ive)ILIJA, 1968年5月1日生于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 住Posavska Mahala, 在逃。

15. STANIC(父名Ive)MARKO, 1957年3月17日生于奥扎克地区Donja Dubica, 住Donja Dubica, 在逃。

16. CUKIC(父名Sime)JOZO, 1967年3月24日生于奥扎克地区Donja Dubica, 住Donja Dubica, 在逃。

17. JURIC (父名Joze)MARINKO, 1960年2月2日生于奥扎克地区的 Donja Dubica, 住Donja Dubica, 在逃。

18. CUKIC(父名Jure)SIMO, 出生在奥扎克地区的Donja Dubica, 住Donja Dubica, 在逃。

19. JURIC(父名Ive)ANDJELKO, 1965年5月21日生于奥扎克地区的 Donja Dubica, 住Donja Dubica, 在逃。

20. JURIC(父名Petar)JOZO, 1962年9月12日生于Posavski Samac, 住Donja Dubica, 在逃。

21. KIKIC(父名Stjepan) MARKO, 1953年11月2日生于奥扎克, 拘留在Duboj 区监狱。

22. TOLIC(Ruza)Josip, 1967年生于奥扎克公社Bijele Bare, 目前在Orasje战场。

23. TOPOLOVAC SIMO,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Ada, 在逃。

24. KAURINOVIC MARKO, 别名“Patak”, 来自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 在逃。

25. DOZIC JURICA, 来自奥扎克地区Potocani, 在逃。

26. BARUSIC(父名Jure)MATO, 别名“Martinac”, 来自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 在逃。

27. BARUKCIC MATO, 1966年生于Moidrica地区的Pecbuha村, 在逃。

• 正在完成关于所犯罪行的资料的收集工作。

28. JURIC(父名Pave)ILIJA, 别名“Bekrija”, 来自奥扎克地区Potocani, 在逃。
29. SICIC(父名Tve)PAVO, 来自奥扎克地区Posavska Mahala, 在逃。
30. SVRZLIC(父名Petar)ANTO, 1967年出生,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Donji Svilaj, 在逃。
31. KOPACEVIC(父名Ante)JVRO, 1962年出生,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Donji Svilaj。
32. ...NIKO,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Novo Selo, 在逃。
33. ...别名“Cutura”, 奥扎克地区, 在逃。
34. DJOJIC ILIJA, 别名“Kelin”,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Novo Selo。
35. DJOJIC TOMO,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Novo Selo, 在逃。
36. TIPURA(父名Mate)... 来自奥扎克地区的Posavska Mahala。

1993年1月5日 Kakanj人S·V·的自愿证词

我1968年生于 Visoko,随家人于1969年迁往 Kakanj。我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现在是政治科学院学生。

我除了要讲述有关这个案件的情况外,还要说一件事,就是我一生从未宣布自己是塞族人。因此我想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在我身上,并不是因为我不是穆斯林,而是因为我的名字是S。

当难民涌入Kakanj时,塞尔维亚族村庄的全部人口开始大批外逃。现在,Kakanj周围已无塞族村庄。以前从未有穆斯林人生活的地方现在飘起了穆斯林旗帜。

月初,Kakanj10公里外的一座塞族村庄被烧毁。烧村的人后来又去了周围的村庄,给村民定下了一两天内离开的最后期限。有一天我祖母被她的邻居赶走,自此后却不能回乡。我祖母年事而高,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她随身未带任何东西。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她家取药和衣服。走近村庄是,我看到了许多陌生的武装人员。我并未在意。我想不会有事,虽然有消息说他们那几天在 Kakanj附近杀害了两人。

我走进祖母家,拿了该要的物品。我在屋子里呆了一个半小时。两人走进屋子,不穿制服,但其中一人穿伪装上衣或茄克。他穿衬衣时,我看到上面有兰花图案。他帽子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图案。另外一人穿蓝色便服。他们进来问我是谁,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祖母的家,在来取她的衣服。我还告诉他们我想取药,因为祖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们说不准我取药,说他们要赶走所有塞族人,因为这一切灾难都怪塞族人。他们诅骂我的塞族母亲。这之后我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这儿随你们,我取了东西就回Kakanj。”他们说不许我离开,他们需要我。我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我试图和他们说话,讲出我自己的理想。我说,哥哥在爱国联盟,我们一直和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我想对他们说明我们在保卫领土陈线领导人中还有朋友。我告诉他们家里人都会找我的,他们正等着我回去。但没用。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让我们走。但他们锁上门,不让我出去。他们吃了些罐头食品。他们让我准备午饭,我答应了。吃饭时,我试图和他们讲话。晚上8点左右停电,到了睡觉的时候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你和我一起睡”。我求他,开始叫喊哭泣。他护扇了我两记耳光,把我拖进祖母房中。我求他让我走。他告诉我哭也没用。他抓住我的肩,把我推到床上。他要我脱衣服。我卷缩着身子拒绝了。他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衬衫,撕掉扣子。他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然后便随心所欲干他的事。他又凑过来亲我,但我用长指甲抓破了他的脸。他一点也未在意。结束后,他说要把我留在那里。他让我去洗脸。

祖母没有洗澡间。他们打来水,拿来劈好的木柴。我洗了脸,洗了澡,回到屋里。他再未进屋。我起床后,他们又让我准备点吃的。然后他们就出去了,销上门,关上窗子。我出不去。村子在铁路线旁边。在铁路线的远处有两、三间屋子,相互隔400、500米。有些靠近森林,因此我什么也看不到。

我开始哭喊。其中一个进来叫我别哭,不然就杀我全家。他又诅骂我的塞族母亲。其中一个说“你要想救自己和你家人,就别吭声。”他去准备了水、木柴和食品,然后又出现了。其中一名离开后,三天未露面。另一名留下来,我们每夜都性交。他不打我,但很粗野。他不多说话,偶尔破口大骂。随着我对他们的谈话理解得越来越多,他们话少了,更多地骂人。他们在Cekrcice和Visoko附近打仗。他们话很少,总有一个人呆在屋里。一个走了,另一个就会回来。这样一直到了九月初的1号或2号。

那时,我开始流血,我想是月经来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你看,你未怀孕,你可走了。”

我猜我哥哥和朋友在找我,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才让我走。这样我就回到家中。我什么也不敢对父母,只告诉他们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们有点怀疑,但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以后我在Kakanj碰到了Fedzad Jasarspahic。他在战前是保卫领土陈线的副负责人。他八月份去了德国,在那住了几天后返回。他担任的是一此重要职务。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建议我别再提这事。因为问题很多。他们已杀了两人,还在一个人身上取血太多造成他在医疗中心死亡。

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去医院中心,他劝我别去,他会做点事情,写一份报告。他问我怀孕了没有,我说不知道。我告诉他有流血。他说很可能未怀孕,一切都会慢慢复原的。但我试图打电话和他联系时,他不接电话,有人告诉我他去别处了。我没敢冒险去医院中心,因为有谣言说他们对塞族人胡做非为。我根本未出去。

同时,HOS(克罗地亚武装部队)人员要我父亲把房子租给他们,说他们会付租金的。他们答应带我出Kakanj,因为我告诉了他们我的问题,想解决这个悲剧。

克罗地亚族人几乎把所有塞族人都赶出Kakanj,只剩一、二百人留下。一天晚上他们说:“准备好,我们要走了。”那天是12月4日。他们先是想走Busovaca,避开穆斯林控制的地区。我们去到Kraljeva Sutjeska。在那等了两、三天,再来到Vares。我们是12月15日到,后来我们到了Vares和Ilijas之间的Nisic。我们随后穿过Nisic附近穆斯林控制的领土,他们便从那里迫回了。我在来自Kakanj的一个朋友那住了一夜。我来到Pale,看到了Serdar教授。他和我谈了话,对我进行了检查,

说我已怀孕五个月了。他说由于没有仪器和工作人员,不能进行适当地检查。他建议我去Loznica Sabac或贝尔格莱德。我因为没钱,那周末走,又等了七天。我星期日到了Loznica。我星期四到了教授让我去看的Krstic医生那里。我们谈话后又通了电话,商定让我去贝尔格莱德。

联邦议会
高级速记员
Milanka Balkovic
记录证词
难民专员

S·V·作证

Mostar 的 K·M 向塞尔维亚共和国
难民专员代表作的自愿证词

我于1955年10月25日生于 Mostar 的 Malo Polje。我住在 Malo Polje, 一个靠近 Mostar 的村庄。我是 Mostar 的“Soko”军事学院的会计。1992年4月(确切地说是4月11、12和13日)制定了强迫劳动法令。我去了 Mostar 的 Avenija 1号, 我的未婚夫 B·S 就住在那里。战争开始后, 我还留在 Mostar, 想保住我的工作。战争期间, 人们可以感到对塞族的不容忍, 后来发展成为仇恨。我们藏在地下室里, 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对塞族人的诅咒。那时食品已很少, 而且只能用克罗地亚第纳尔来买。邻居们把头扭向一边, 好象根本不认识你。我们的军队撤退后, 庆祝开始了。他们自认为“真正的解放者”, 到处开枪, 大叫大骂。这也是仇恨开始之时。他们首先带走知名的塞族人, 后来连普通塞族人也都被开带走了。真正的庆祝, 特别是穆斯林的庆祝在一座塞族人教堂被炮火击中之爆发, 像发狂一样。教堂几次被炸, 连地基都不存在了。

电话呼叫“Soko”军事学院的工人汇报他们的工作情况。我们去了, 但被公开地告知“Soko”已没有塞族人的位置。我的同事对我说, 塞族人应斩尽灭绝, 她完全同意这种做法。她是穆斯林, 和一位克罗地亚族人结婚。别人的看法也一样。

1992年7月13日, HOS人员闯入我的住所。一共五人。“准备好, 我们要带你去散散步,” 这是他们的第一句话。我的未婚夫, 他的父亲和我穿上衣服, 由他们中的一人带去前军事医院。两人留下搜查了住所, 寻找 ST·Sava 的像片, 这是听一些邻居说的。他们也想带走这位邻居, 但他因妻子瘫痪得以幸免。

HOS的人员拿走了我们所有的文件、钱和金了。他们拿走了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住所也被抢劫一空。HOS成员、监狱看守 Hamo Bosnjic 住进我们的房子。他们不经审讯就把我们和另外5、6名女囚带到监狱中一个小室里。我们在狱中的第一夜遭强奸。一个女孩子两次被奸, 后来才被人制止。我可以指出下面这些HOS成员的名字: Vniko Martinovic, 也叫 Stela, 是他们的指挥官; 他的副手也叫 Vinko Martinovic, 后来参加了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 再就是 Kapetanovic, 不知姓什么; Tvan Zelenika, 也是 HOS 警察审讯处一个头子。他们对妇女施行酷刑的程序不象对男子那么严重。那里也有人打架和其他事情。妇女整日地工作, 有时受到 Ustashi 分子的挑衅。

我在 Mostar 呆了七天, 我的未婚夫被送到 Dretelj。我们听到了有关 Dretelj 的各种说法。我离开时非常害怕。有两座飞机库, 一座关男人, 另一座关女

人。男人衣冠不整，满脸胡须，因为洗澡、理发和刮胡子都被禁止。由于缺水，妇女只能勉强保持个人卫生。男人用20升的罐子打水。每次要挨揍。因此，妇女尽量节约着用水。你越难看越好，因为这样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总指挥官是 Blaz Kraljevic 将军(我们这样称呼他)。他带着一伙5、6人的 Ustashi 分子，每天探访关押囚人，对他们颇有礼貌。但情况一天天变坏。可能是他下的命令，因为他说过，他恨塞族人超过世界上的一切。

男人当着妇女的面受可怕酷刑，不分昼夜地被拷打和受其他形式的侮辱。他们说我们塞尔维亚族人不是人。每天都有持枪的卫兵在我们周围。让我说出其中一些：Hasan Topovan (Brada)、Ahmet Matikan (Maks)、Suzana (Zagorje)、Zerina Suta, Zvonko Bjelis (Crvenkapa)、最坏的那个拘留营指挥官 Srecko Erceg、Toni Raic、Ilija Raic (唯有他从未打过人)、Marina 和他妹妹 Gordana。还有很多，但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在 Dretelj 时，不少妇女遭到强奸。Edip Buljubasic 来到 Dretelj 任拘留营指挥官。他管的三天可怕极了。一天晚上，他们强奸了我们机库的妇女。门打开后，手电光从一张床照到另一张。我们不敢争眼，假装睡觉。Ustashi 分子(这次是 Hasan Topovan 和 Vniko Primorac)踢一名妇女，说：“起来”。他们把她带走，又带回。约15分钟，又开始下一个。又一次电光和一声“起床”。一次又一次，人们心里害怕极了。只有在第二天我们才能发现谁被带出去了。但人人都保持沉默，不愿让别人知道。当 Ustashi 分子问有什么问题，你说没有，一切正常。第二天我看见一名男子被警棍和铁锹打死。他名叫 B·B。他妻子也在场。他们在杀害了她丈夫后还问她想不想去看浑身是血的丈夫。而后监狱警卫 Marina 挑衅说他要拿头当球玩。每夜，手电光从一名囚犯身上移到另一名身上...你恐惧浑身出汗，用被子盖住自己，不让人注意到。简直难以描述。

1992年9月17日，我们被HVO接管，他救了我们。只有在 Grabovina 我们才受到了人的待遇。你也能说自己是塞族人了。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恢复了元气，然后被带往 Ljubuski。那里食宿条件差极了，我们睡在水泥地板上，只铺一件毯子。我们拿衣服当被盖。我们在那里5、6天，之后被带到 Pakovo Selo 交换，交换未成功。从那里我们被分批带到“Lora”过夜，然后又到了 Ljubuski。9月21日我们被带到 Mostar，后又被带到 Radoc 的高级军事中学。我只知一名卫兵的名字叫 Snoda，他来自 Grabovina。他是好人。在 Mostar，食品很差，心理压力巨大。我们第一次有床睡觉了。Mostar 的指挥官是 Mile Pusic，他的副手是 Josip，不知姓什么。其他指挥官是 Ljuke 和 Branko Jedvaj，卫兵是 Ante Bukovac。Jasna Skaljic 负责管妇女。我们在 Mostar 被当作战俘对待。我们于10月30日被红十字

会所救。我离开监狱时个人物品只有鞋、裤子和一件衬衣。连身份证也没有。HOS
毁坏了一切。

M·K(签名)

难民专员

Dretelj拘留营拘留犯B.V.的证词

“我1937年10月10日在Capljina城的Klepci出生。我是工人、塞族人、住Capljina。

1992年6月10日，HOS(克罗地亚武装部队)的宪兵Mirsad Repak和Mile Vego进入我的住所，第三名宪兵看门。他们进来后便对我说：“这是穆斯林家的房子。”他们让我躺在地上，用手枪在我头上方射击。我躺在地板上时，他们抢劫了屋子，抢走了所要的一切。他们拿走了我的个人证件和钱，说我再也不需要这些了。他们搜查了房间后把我带走，不许我脱下晨衣换上便装，说没有必要。我和一名塞族邻居B.B.一起被带到了Dretelj拘留营。

我到达Dretelj时，一名来自Opuzen的HOS人员Zvonko Bjelis，绰号Crvenkapa(小红兜)的抢走了我的全部金首饰。他后来审讯了我，也是对我施刑人之一。在Dretelj，他们把我关在一间3米长、2米宽的带栏杆的屋子里，当时那里已有3个被捕妇女，她们是O.D.，医生，塞族人；J.M.，教师，塞族人；A.V.，家庭妇女，塞族人。每两天他们就送进新的拘留犯，有男有女。男女被分开，只有当HOS人员带男人去工作时，我们才能看到他们。

我们一一遭到审讯和酷刑。我经受了各种威胁：他们就警棍击我的腿和身体，扇我，往指甲里钉针，用蜡烛烧我的耳朵，在我胸上捻灭烟头，用刀切开内衣割我的乳房。来自Ljubuski的Mirsad Repak、Zoonko Bjelis、Ivan Medic对我施行了酷刑，其他人的名字我不知道。

第一天晚上他们还强奸了我。他们审讯我达7至10天；他们也审讯了其他妇女，这些妇女也遭到强奸和酷刑。我胸上有伤疤，这是他们熄灭烟头留下的。棍打的伤痕已看不清了，但我的手臂还在隐隐作痛。

O.D.，一名医生，遭受严重酷刑。她出生在Tasovcici，在Capljina生活和工作。她是1992年5月9日被带到Dretelj的。在我之前，J.M.于5月15日，A.V.于10天后被带到拘留营。

一个月后，我们来到Dretelj，被转移到机库中，男女分别关押在两座机库中。他们每天都带来新的拘留犯，使房间再也没有更多的空间。机库的地板是水泥的，天花板是柱子和胶合板制成的。我们就睡在地板上，没水没电，也没有卫生设备。年龄在30岁至80岁的70名妇女被关在这里。

在我们到达Dretelj的前10天中,他们强奸了我和所有其他妇女。我们被分别审讯和施以酷刑。我被告知:我所以受刑是因为在我住所发现了《1941年至1945年塞尔维亚族人的灾难》这本书和从Prebilovci转移尸骨的照片。因此,他们把我打得半死。

10天后,对我们施刑的人发表了某种命令,停止强奸妇女。但他们继续对我们身心用刑。

拘留男人们的那间机库离我们不远,他们挨打时,我们听得见。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无时无刻不在遭受酷刑。全家都被关在拘留营中:父亲、母亲、女儿和儿子。

S.B.和我在一起,她丈夫B.B.在另一座机库中。1992年8月2日,他们用工具架打他,从下午2点一直打到凌晨1点。他第二天死亡。早晨,Edim Buljbasic,一位后来参加了HOS的前JNA官员问S.,B.B.的妻子,愿不愿见她已死丈夫最后一面。

妇女看到了男人们遭受酷刑。由于天热,他们偶尔让我们离开机库,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男人受枪托、警棍拷打,被脚踩,还被迫吃地下的草。八月初,他们把三个男人:D.R.,D.R.和M.B.带到我们的机库,他们遭受酷刑,遍体鳞伤,整整三天后才逐渐恢复生机。我们这批女人都尽我们能力帮着他们复原。HOS成员把他们藏在我们这里是为了不让其他男囚人看到,告诉他们这几人已被枪毙。

我们在Dretelj一直呆到1992年8月17日,之后被转往Mostar附近的Grebovina军事监狱。我们在那里被HVO(克罗地亚国防委员会)接管。9月15日我们都被转往Liubuski监狱(Ustashi分子的巢穴),是Paraga军队的最大据点。1992年9月19日,我们被带往Pakovo Selo交换,但未成功。我们在Zora监狱中被分开,妇女留在狱中,男人站在监狱院子中,这样度过了9月19日到20日之间的一夜。我们在Liubuski度过第二夜,9月21日被带往Mostar附近的Radoc监狱,在那一直呆到10月30日。这天我们被国际红十字会所救,1992年9月8日我们在Grebovina得到登记。我的登记号是第x号(为保护仍在狱中的证人的家庭成员,这一号码被隐去)。我们在所有的拘留营中都被当作战俘对待,而不是当作离家的平民。10月30日,我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了Zelenika。我现在住在Baosici的难民营中。”

1941年,B.V.曾进过Capljina的Modric Ustashi拘留营。被捕的所有男人都被赶出,拿到Capljina附近的Bivolje Brdo枪毙,扔入坑中。她哥哥和父亲就在其中。1990年,他们的尸骨被移至Prebilovci的纪念室。这座纪念室被Ustashi分子炸毁,变成了垃圾堆。1944年,Klepci村的所有妇女和儿童都被抓获,带到Capljina的拘留营,准备转去Jasenovac集中营。“德国人想用人交换他们死亡的士兵,这样Ustashi分子将我们释放用来交换死亡的德国人。”B.V.在两个拘留营中生存了下来,现在

又在第三个中生存了下来。她的塞族人居住的Klepci村三次被夷为平地：1941年、1944年和1992年。

“我在 Dretelj 被关在囚室屋时，同时还关进了下面的人：R.Z. (家庭妇女)、G.S. (家庭妇女)、M.P. (一位同塞族人结婚的穆斯林)、Z.M. 和 S.Z. (退休者)。我们四人——O.D.、J.M.、A.V. 和我，以及后来上面提到的妇女受到最严重的酷刑。”

注：B.V. 的证词已签了名，但在她的明确要求下，这里不提她的名字。她希望这一证词保密，因为她的近亲仍在拘留中。

(这一证词是向塞尔维亚共和国难民专员的代表作出的)

来自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的
塞尔维亚族人Konjic
家乡俱乐部
1992年7月15日

1992年战争爆发前HOS(克罗地亚武装部队)
对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Capljina)
塞尔维亚族人口犯下的罪行

1. O.D. 博士,1958年生,Capljina人,微观生物学专家,住Capljina。

1992年4月25日,她在自己的住所被HOS人员逮捕。HOS人员在把她转送到Dretelj拘留营前,每天都强奸她,每次几个人。他们强迫她裸着身体游街,威胁她在生一个“Ustasha”之前不会让她死。他们用烧红的铁烫她的身体。在Dretelj拘留营中,她除了被强奸外,还遭受酷刑(往她指甲中楔钉子)。她试图自杀。她是三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她被捕和受刑的唯一原因是她是个塞族人。

注:O.D. 现住在Visegrad。她在Novi Grad电视上公开讲强奸的情况,但不涉及细节。她说一名65岁的老年妇女因遭强奸死在Dretelj拘留营中,还有一个女孩自杀。她于1992年8月被交换。她丈夫说她的心理状况极差,她再也不愿谈自己经历的灾难了。

2. J.M.,1946年生,Prebilovci人,教师,住Capljina。她在住所被捕,被带到Capljina的一间烟草仓库中。她每天都遭受酷刑和强奸。她被迫裸着身子游街,被说成是一名“塞族妓女”。她多次试图自杀。她身心状况极差。因为她记下了塞族妇女强奸者的名字,所以直到最近才被交换。

注:7月15日,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协会根据第1503条秘密程序向人权事务中心提供了这两个案例。

请对这些姓名给予适当的保护。

塞尔维亚委员会

资料中心

K.S., 塞族人, 1941年5月13日生于Glamoc,
作了以下

证 词

1992年5月中旬, Bosanski Brod的塞族人开始遭到逮捕。克罗地亚宪兵人员来到塞族人家中带走男男女女, 进行审讯, 再也不见他们回来。

1992年7月7日下午2点, 克罗地亚宪兵闯入我家, 逮捕了我和丈夫D.S.。我们被带到Bosanski Bord的体育馆。我被关进体育馆的妇女间, 我发现那里已有12名塞族妇女, 有些已来了一、两个月了。她们是S.Z. (约65岁)、M.S. (约54岁)--她的脚上刺上了克罗地亚旗的图案, 因为她的两个儿子没在克罗地亚一边打仗--G.N. (1962年生)、H.N. (来自Kobas的穆斯林, 约40岁)、R.S. (约70岁, 未受虐待)、S.V. (约30岁) 和一个来自Bosanska Gradiska的名叫Smilja的妇女, 她的姓我忘了, 她很老了, 因此未受虐待。我丈夫被关在男人房间里, 同他一起已关了许多被捕的塞族人。

夜间, 克罗地亚士兵在阳台上、在地下室、在过道中拷打男人, 只要手够得着就打。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喊叫。他们受到前线回来的克罗地亚士兵拷打。白天他们被迫劳动, 洗克罗地亚人的车子, 挖战壕等等。

1992年7月中旬, 我记不清日期了, 前线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我听到克罗地亚人一夜之间就杀害了12名塞族人。他们在体育馆中杀害了这些人。我听到了12声枪响, 所以我想有12人。我听到他们把这些人装入尼龙袋, 开动小车把他们的尸体带到别处。他们回来时, 我听见一名克罗地亚士兵说: “让他们沿Sava河漂到米洛塞维奇那里吧”。我的房间有一个窗子, 对着克罗地亚士兵聚集的阳台。其中一人看见我, 说: “她看到了一切, 她妈的。”因此我坐在垫子上整夜未睡。我以为他们当夜就要杀我, 因为士兵们闯入屋子, 其中一人说: “这人完蛋了。”然而, 拘留营头目过来了, 我不知他叫什么。他让他们平静下来, 说, “凡事都有个限度, 你们得为此负责。”说完他离开了屋子, 士兵们也跟他走了。自此以后的三天中, 无人来看我们, 也无人来送食物。我不知道被杀害的塞族人的名字。

我们妇女被强奸。Djuro和Dragan Lepan把克罗地亚国徽图案刻在M.S.的脚上, 他们还打她。他们把带有国徽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国旗图案刻在她脚底板上, 还割她

下臂。老年妇女已不能和穆斯林人和克罗地亚人性交,就被迫去舔他们的器官。10到15名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进入我们洗澡的屋子,在那里强奸我们。因为他们没有钥匙,便把H.N.一位穆斯林妇女从分隔男女房间的墙上拖出去。她被强奸后回来时,已精疲力竭、伤痕累累。他们把手枪和警棍塞入她口中,把手塞入她阴道,用手头东西乱打她。6、7名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轮流强暴每个妇女。年轻妇女在1点到5点之间被带到Korace、Kricanovo和Sijekovac遭受强奸。我们被强奸,直至昏迷。但他们又在厕所里把我们弄醒,浑身是血地送回。我们一到夜晚就感到害怕。

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代表到来时,我们被赶进车里,送到Sava河边的Kayak俱乐部,在那里过了三天,直到联合国人员离开。我被一名叫Nervin的穆斯林人押送,他曾强奸过我。Indira接替了看管我们的宪兵。我问她我们为什么被带到这里,她说是为了躲避联合国保护部队。没有人看到我们。

1992年8月25日,我在Bosanska Gradiska被交换。1992年8月20日,我们被带到“Beograd-Tulek”商场的仓库,在那里过了五天,第六天被交换。在我们这群人中有4名男子、5名妇女得到交换。男人们只有在夜间才被带回仓库,白天要去一个不知名的穆斯林家中干活。

我丈夫未和我一起得到交换。R.M.嫁给了一名穆斯林人。H.N.是穆斯林人,是个精神病患者,不断遭到强奸。她俩和9名男子未被交换,又被送回体育馆。

来自Prnjavor的Dj.先生当时和我丈夫在一起,他告诉我妹妹J.M.,在1992年8月31日至9月1日的夜间,我丈夫遭到了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全天拷打。这之前,他把染满血迹的衬衫扔给了妇女房间里的R.M.。他被拷打后,全身是血。宪兵们打他的那间屋子的墙也都溅满了血,要塞族人去洗净。我丈夫被扔在床上时还活着。一名宪兵进入房间用瓶子击打他的头部,但他没有动静。半小时后叫来一名医生,签字证明我丈夫自杀身死。他被放进一口锡棺材中带走了。

1992年4月,Milorad Vukovic(约60岁)被捕,后来发现他的尸体在Sava河上漂流,和另一个男人的手捆在一起。他已被砍头,克罗地亚人还给他照了像,让他在Bosanski Brod的妻子Borka Vukovic看。

1992年6月,Veljko Pepija(约40岁)在自己的住处被宪兵逮捕,再也未回来。

Bosanski Brod的许多妇女每夜都遭受强奸和酷刑,许多塞族男子也无影无踪地消失。

我再次回到了Bosanski Brod,看到了丈夫的坟墓。在拘留营和我在一起的一些妇女也被交换。

贝尔格莱德,1993年1月7日

证词记录:Ksenija Lukic

作 证:K.S.

原证词存在塞尔维亚委员会资料中心的“波斯尼亚北部强奸”档案中。

塞尔维亚委员会

资料中心

G.C., 塞族人, Konjic 附近的 Donje Selo 人, 临时住在 Boracko Jezero, 作了以下

证 词

1992年5月20日,我和家人生活的塞族人村庄 Bonje Selo 遭到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的袭击。Rajko Ninkorić (45岁)就是那时被打死的。第二天,即1992年5月21日,另一个附近的塞族人村庄 Bjelovčina 也遭袭击, Bonje Selo 则再遭炮击。1992年5月22日,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士兵逮捕了村中的所有男性居民和大批妇女,带往 Bonje Selo 7公里外的 Čelebići 拘留营。那天,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士兵烧着了9座塞族人的房屋。我的房子第一个被烧,因为我家较富。烧毁的有一座约600平方米的房子、一间商店、一间咖啡厅、一座建材仓库、一座居住面积50平方米的阳台和农场住房。

1992年5月25日,一个纯塞族人村庄 Bradina 遭袭击,被夷为平地。

这几天中我一直住在姐夫 T.Ć. 的家中,因为他的房子还未被烧。Bonje Selo 沦陷后,我丈夫和其他村民没有向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投降,而是躲藏在附近。1992年5月27日,一些人来到我姐夫的房前,他们是: Ševko Nikšić (Konjic 的一名警长,曾是我丈夫的上司), Jasmin (警察局头目), Zvonimir Belšo “Nono” (警察局前局长), Ibrahim Djuro (“萨拉热窝”足球队队员)和其他一些见面认识但不知名子的人。他们烧了四座塞族人的房子:我夏天别墅、我姐夫M.C 的房子、OC的房子、T.Ć 的房子。1992年5月27日那天, Konjic 的一名穆斯林人Sadik Teletović 杀害了我姐夫 M.Ć. (1937年生)。他曾强迫我姐夫说出军队到来时我们藏身的地方。

当时我和姐夫 T.Ć. 一起被捕,被带到 Čelebići 拘留营中和军队放弃的 JNA 军营中。我在那座拘留营中被交给了拘留营的副指挥,一名叫 Azem Delic 的 Konjic 穆斯林人。他问我丈夫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便开始打我,还威胁要把我送到Grude, 一座关押塞族人的拘留营。另一名来自 Dzajic 的穆斯林人和 Čelebići附近的 Zbar 村的 Ćosić 当时也在场。Azem Delić 让 Cosic 站在门口, Dzajic的那个穆斯林人躺在床上, Azem 则动手脱我的身服。我以为他要用棍子打我,但他强奸了我。他是强奸我的第一个人。他们随后离开。我一人被留下那

里。过一会又来了一个名叫“Šok”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他曾在 JNA 中服军役，JNA 撤退时，他决定留了下来。他也想来强奸我。我拼命抗拒哭喊，最后他道歉，离开了。我自己单独过了一夜。

我单独又过了另一夜，没有人碰我。但第三天夜里，他们把我带到接待室。我记不住时间了，只知道进来了很多人。他们令我脱去衣服强奸我。由于天黑，我未认出这些年青人。有三个人强奸了我，第四个没有。第四天夜里，他们从 Bradina 带来年轻塞族妇女，强奸了她们。这些年青妇女在时，他们没有碰我。

1992年6月15日，来自 Donje Sele 的13名塞族人在他们被拘留的 Konjic 体育馆中被一发炮弹炸死：

Vellmir Ćećez (1952年生)、Vlado Ćećez(1950年生)、Miloš Ćećez (1950年生)、Dušan Ćećez(1952年生)、Pero Ćećez(1964年生)、Mirko Ćećez(1952或1953年生)、Predrsg Kuljanin(1965或1966年生)、Tihomir Kuljanin(1959年生)、Rade Ninković(我猜他是1949年出生的，但不确定)、Mirko Ninkovic(1963年生)、Stevo Ninković(约1968年生)、Novica Žlvak(1966或1967年生)、Željko Ćećez(1966年生)。

他们被害后被埋在房屋周围、而不是墓地中。来自一个穆斯林村庄 Prevolj 的穆斯林人炮击了这座体育馆。我把这一切告诉了 Nurko，我又哭又喊，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是被他强奸。他随后把我送回屋子，再也没有强奸我。Azem Delic 把 M.A. 带走了几次，把她留给自己，不许别人染指。

1992年7月，穆斯林人把 Zukici 的5名妇女带到了拘留营，其中有个13岁的女孩。Delic 曾试图强奸这个女孩，但来自 Konjic 的拘留营指挥官 Pavo Mucic 阻止了他。妇女们遭到毒打，甚至连这个女孩也被警棍击打，全身被踢。第二天早晨，Pavo 出现在门口询问她们的情况，她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他问那个女孩：“小女孩，你害怕吗？”女孩说：“当然害怕”。于是他进行干预，把她们释放，亲自开车送她们走。他把这个女孩送到了她亲属那里。但那几名妇女却被 Redzo Balic，一个 Bradina 附近 Bale 的穆斯林人杀害。这几名妇女是：Sofija Djordjić(约65岁)、Andja Djordjić(约45岁)、Mara(老年妇女)、Jelenko Djordjić(约47岁)。他的两个儿子还在拘留营。我想指出，来自 Zukici 的人没有武器。我从 M.A. 那里和穆斯林卫兵那里得知这一情况。

我在被关押拘留营期间内看到塞族人遭受穆斯林人的酷刑。我看到了 Bradina 的“Devetka”通道，看到穆斯林人把塞族人带出，让他们靠墙而立，举着双手贴几个小时，或让他们在寒冷的雨中坐上几个小时，强迫他们背《古兰经》。谁不会背《古

兰经》谁便挨打。我目睹他们拷打杀害了 Slako Šušić, 一个40岁的教师。Delic 用棍打他的后背, 打到半死, 倒在地上还继续踢他。他们指控他拥有一个电台, 实际他没有。他的罪是因为他是个知名的塞族人士。就我所知, 有17塞族人死于拷打, 他们是: Pero Mrkjić (60岁, Bradinat)、Simo Jovanović (50岁, Zbar人)、Čedo Avramović (1949年生)、一个教师、几个 Bjelovćina 的塞族人, 还有几个我不知名但见面可以认出来的 Bradina 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几次来到 Čelebići 拘留营, 但我们妇女被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我不知道男人们是否也被藏起来。我们不许出去, 不许在窗口露面。但红十字会代表要离开时, 我看到了他们。我向他们求救, 他们这才知道了我们妇女的情况, 记下了我和 M.A. 的名字。不久后, 在1992年8月31日, 我们获释。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访问后, 许多男人因说出遭穆斯林酷刑而被打死。他们在 Nedeljko Draganic (塞族人, 17岁) 腿上洒火药, 点着, 还把烧热的刀按在他身上。他伤痕累累, 但最后被释放。他们将一把烧红的刀放在来自 Konjic 的塞族人 Spasa Miljević 身上烫他。一名来自 Bjelovćani 的出租车司机 Dusan 也被刀烫。有些人, 象 Branko Gotovac (Vinište 人, 1937年生), 因被迫干重活而患上疟疾。我离拘留营很近, 看到了这一切。Srdja, 一名 Brdina 的塞族人手臂被打断, Sava Djordjić 左耳被砍掉, Nedjo Kuljanin 的小手指被砍掉等。我看到塞族拄着拐杖, 手臂上和头上打着绷带、精疲力竭。有的被杀害, 收尸体时, 穆斯林就说他们死于白血病、绝食和心脏病。他们说 Žarko Mrkajić 被 Slavko Šušić 勒死, 而我看到他是被 Azem Delic 杀害的。

我丈夫躲在 Donje Selo。我在被关押在穆斯林拘留营期间, 一点不知道他的情况。1992年8月31日我回到村中, 姐夫告诉我, 儿子已于1992年8月30日去塞族人领土了。我见到姐夫还留在村中, 觉得很惊讶。他告诉我我丈夫于一周前离开, 儿子同他一起去了。我姐夫自己的孩子躲在房子周围, 1992年8月29日, 他们沿 Neretva 河朝 Bijela 村的塞族人领土出发。1992年8月22/23日, 我丈夫踩雷身亡。我们的儿子总算到了塞族人领土。我姐夫的儿子1992年9月2/3日被害, 我们到9月5日才听到他们死亡的消息。Jasna Džumur, 穆斯林人, 负责 Konjic 的拘留犯的国家委员会主席在四名穆斯林士兵的陪同下来到我跟前, 叫我去确认死者。我不想去, 但他们强迫我去。我姐夫的孩子 R.Ć. (1964) 和 R.Ć. (1965) 还可认出, 但我丈夫的尸体已无人形, 全身变黑, 眼、耳和大脑被挖去, 我几乎认不出他。1992年9月7日星期日, 他们允许我们掩埋了姐夫的孩子, 我丈夫的尸体则到1992年9月18日才交还给我。这多亏一名克罗地亚人 Zdenko Šagolj “Pisak”, 他说, 出于人道, 尸体必须交还。我们把

他埋在我姐夫房子的周围。

我终于设法逃离了穆斯林的领土,和孩子们到了塞族地区。我们失去了一切,但还得生存下去。我的唯一希望就是孩子。

贝尔格莱德

1993年1月7日

证词记录:

Ksenija Lukic (签名)

作证: G.C.(签名)

原证词存在塞尔维亚委员会资料中心的“黑塞哥维那强奸”档案中

塞尔维亚委员会
资料中心

O.G., 1940年10月20日生于Vukovar, Vukovar人, 1992年2月20日在贝尔格莱德作了以下

证 词

1991年10月23日,我在Vukovar家中被手榴弹炸重伤,送到Vukovar医院。我丈夫也和我一起在医院。我住院约八天。我的床在内科病房的楼道中。由于我和丈夫长期受雇于这家医院,所以我们认识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对我这个重伤的病人态度极端恶劣。手术大夫懒得去包扎我的伤口。我在医院中看见了T.J.和他的妻子V.。我们是邻居,彼此很熟悉。T.J.也受重伤,右腿从膝以下被截。V.悄悄告诉我,一些受伤的塞族人即将出院时在夜间失踪。她未提到任何名字,但因她丈夫T.在医院的地下室工作,她去看丈夫时知道了这些情况。克罗地亚国民卫队的人员手持步枪,经常到医院来。他们到来时,还举起两个手指向Vesna Bosanac医生和Jaro Njavro医生致敬。1991年10月30日晨,护士长Binazija Kolesar,绰号“Biba”,对我说,我必须离开医院,将被送到“Borovo”联合体的“Komerc”避难所。他们竟强迫我这样一个头、背和脊柱受重伤的人去那个地方,令人惊讶。我求他们让我在医院中住到第二天。Jagetic医生过来时,我要求去我丈夫所在的地下室,但他告诉我这不可能。他去见了Vesna Bosanac医生,然后回来说,我和丈夫第二天都将被转往“Komerc”避难所。

第二日晨,约七人被转往“Komerc”避难所:我、我丈夫V.、T.J.、他的妻子V.、V.V.和两名妇女,多为塞族人。

我们来到“Komerc”时,那里的指挥官是一个叫“Brko”的人,他长相黝黑,只两天便消失了。他记下了我们的名字。和他在一起的人叫“Gagi”,约30岁,棕色皮肤,短头发,一只耳朵带耳环,耳的两侧剃了三条线。他拿着枪,身上穿伪装制服。这个避难所中有很多ZNG(克罗地亚国民卫队)人员,多为伤员,有两三个穿制服的妇女和大约30名塞族男女,也大多受伤。我们不得不保持缄默,不许说一句话。“Gagi”冲我们吼叫,而对其他人却很好。

Martin Sablić也在避难所里,他是在我们转来两天后到的。“Gagi”召开了一

次会议，告诉我们会有一些变动：从此刻起，Martin Sablić负责指挥平民，而他“Gagi”则指挥ZNG。

Bartul Domazet也在避难所里。他是从医院来的，也受了伤。有一次，他冲着T.J.破口大骂，说那里正在建立塞尔维亚突击队员的巢穴，占了本应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战斗员的床位。T.J.保持沉默、未吐一字。

Vesna Bosanac的丈夫Lalosav Bosanac偶尔来避难所。他是整个“Borovo”联合体的指挥官，包Martin Sablic在内的其他人都属他领导。Arvaj Karcika也在避难所中，忙得很，给Martin和“Gagi”当跑腿，总是指使人干这干那。

1991年11月4日，来自Vukoar地区Preradoviceva ulica的一名年轻人被送出“Komerc”避难所。他父亲是名屠夫。Sinisa受了伤，在医院住过。他是塞族人。“Gagi”一伙开车把他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再也不见他回来。我不知他的下落。

1991年，11月5日，“Gagi”和两名ZNG的宪兵来到T的身边，要他说出儿子在哪里。他告诉他们，儿子在Oeijek，在那里工作。“Gagi”说要让他看一部电影，他就会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还说自己要代替卫兵看守。“Gagi”和他的两名警卫接着离去。T.说他有预感，说夜里要有变故，他要被带走，活不成了。同屋的人都哭了。

1991年11月5日，“Gagi”过来问我丈夫V.在哪里。看到我丈夫，要他跟在后面走，我丈夫只好随他出去，另一人立即被带来占用他的床。我求他告诉我丈夫在哪里，他说不知道。由于我哭喊着要见我丈夫，Kuzmanovic医生低声告诉我说，他在Vukovar监狱中，同他在一起的还有V.V.和另一名同一天、更确切地说同一夜间从避难所被带走的人。也就是说，他们3人都已被带离避难所。

我们不断受到监视，不许相互交谈。我们认识的克罗地亚人离远远地躲开我们。

1991年11月6日，T.J.拄着拐杖被“Gagi”带离“Komerc”避难所。尽管许多人被带走，Martin Sablić却一直留在避难所中。他知道发生的一切。但人被带走时，他从不露面，只有“Gagi”来看看。T.J.再也未回来，不知下落。据说“Gagi”来自Sinj，住在Jarvina某地或一座附近的村中。

T.J.被带走后，我和V.单独在一起。1991年11月7日晨，Ana Lu Kic来到“Komere”避难所。她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家的朋友。她和丈夫Bogdan在医院中工作。她告诉我说，她是夜里2点左右来的，不得不逃离躲藏了一个月的那间地下室，因为那一夜她遭一名警卫强奸。前几天夜间他不断地来到地下室威胁要杀她。她告诉我说，她求这名警卫别这么做，说她都可以当他的母亲了，但警卫答说，他根本不在乎，然后就强奸了她。于是她逃离地下室，来到“Komerc”避难所。那在那里她受到

一名宪兵、一个金发妇女(管所有名单)和Arvaj Karcika的审讯。她承认被强奸了,因为她被人当作间谍。他们叫她向Martin Sablic汇报,第二日早晨,她这么做了。她同Sabolic很熟,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她很害怕Martin,不停地对我说他会杀她。

1991年11月7日夜,我们从“Komerc”避难所被转到“Nova Obucara”避难所。Martin Sablic也来到这个新的避难所当指挥官。Bartul Domazet也过来了,两人决定避难所中一切事务。一名叫“eiptar”的警卫和他们在一起,他总是全副武装,身上带着刀、斧、炸弹和步枪。他戴一顶黑色尖顶帽、穿一件黑茄克衫。他在避难所里不停地破口骂“一枪崩了你,一枪崩了你”。Martin不时到避难所巡察,只看看,一句话不说。I.V.和Ana被分离关着,隔得很近,不准去别的地方。避难所的警卫是Franjo Bauer;他妻子Violeta负责点名和分发食品。来自Bogdanovic的和Stipo Kovacevic也在这里,他对我施过酷刑。Sabolic和Gartol带着枪。1991年11月16日或17日的8点至9点间,Martin Sablic、Bartol Domazet、“Siptar”、Stipo Kovacevic、Franjo Bauer和两名ZNG宪兵来到我们的房间,Sabolic说要搜查寻找武器和刀子。他指着我们3人,命令彻底搜身。

Franjo Bauer、Domazet、“Siptar”、Kovacevic和两名宪兵搜查了我们。每搜完一次,Martin就命令再来,一共搜了三次,还是没有发现什么。Martin说,“现在由我来”。他亲自对Ana进行了彻底地搜查,坐下来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Ana感到害怕。对我和V.的东西则没有被这么彻底搜查。Martin在搜查Ana时,发现了四本士兵证书(属于她的丈夫和儿子),两本护照和两、三本存折。他找到这些东西后问她丈夫和儿子在哪里,而且说她丈夫向他们开过枪射击。Ana说,丈夫儿子都在Subotica。Martin从存折中看出钱一个月前已被取走,由于存折上写的是她丈夫的名字,便指控Ana窝藏她丈夫,说这些存折便是证明。Ana说是她自己把钱取走的。他便问得到了谁的授权。她说未得任何授权,因为她认识银行的出纳员,这名出纳员便把钱给她了。Martin不信她的话。他说他们怀疑她想逃走。Bauer补充说,她应当为持有士兵证书感到羞耻,说他自己就为当过兵感到羞耻,所以已将自己的士兵证烧了。在整个搜查过程中,“Siptar”站在Martin身边观看。Bartul走来走去,看着搜查过程。这时Sabolic看了一眼“Siptar”问到:“你把东西拿走了吗?”“Siptar”回答说:“是的,一切都办好了。”Sabolic怀疑地看着Ana说:“还要搜”。

Sabolic审问了我,问我丈夫在哪里,是否来自有名的Vukovar家族。他说他知道我丈夫在哪里工作。

警卫在V.身上发现了她和丈夫的护照以及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说:“天呐,这

是T.J.的妻子”。Martin检查了这些物品。他把士兵用书和护照交给宪兵,说这些物品属于他们。他转向V.和Ana,指着她俩说:“你,还有你,收拾东西”。他命令我上床,将身体和头用纱布包捆。然后,“Siptar”带着Ana和V.走出了楼道出口。过了一会,我让一名妇女去看看她们在哪里,她告诉我说她们坐在避难所门口。一个半小时后,“Siptar”将Ana和V.带回我们房间,但他一直密切监视着她俩。随后消防工作进门将蓄水池里灌满水;他们完成工作后,“Siptar”点头示意Ana和V.起来跟他走。她们离开后再也未回来。她们拿走了所有个人物品。

在投降前夕,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妇女连续两夜走进逐个房间点名,说如果被点名的人不站到走廊里排列就立即处死,知情不报的人也要处死。有一天夜里,他们点了15个人的名字,把他们从避难所中带走,其中包括Lusac的Vros Neducic和一个叫Ostojic的人。我根据他们的姓名猜他们都是塞族人。第二天夜间,他们读了6、7人的名字,也把这些从避难所中带走。一部分人被带到了餐厅,看来人数不少。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审问。我没敢出去,因任何人都不许离开房间,因此我未看清那些人是谁。我当时还知道他们的名字,现在已记不住了。投降前的一天夜里,Martin Sablić和Bartul来了,要求所有人交出HDZ徽章、证件和其他标志。他们降下了入口处的克罗地亚旗,把徽章和文件塞进一个大袋子里带走。10分钟后,所有穿制服的人都换了便服,大多是工人的工作服。

我在避难所看到人还有Jure Marusic。他曾献过血。他总是在避难所中转来转去,张口骂人,总是在他的住房内外和Sablić接触。一名带着武器胖胖的年轻女人也常和警卫一起去Sablić的房间,好象在找人上前线。我不知他们带走了谁,他们不许我离开房间。他们总是急急忙忙、十分紧张地干这事。有一次带人时有人在楼道里放了一枪,但我不知道是谁放的。

O. G (签名)

注: Ana Lukic 已被害(得到她丈夫的证实)。

在塞尔维亚委员会资料中心。“Vukovar”档案。

XX XX XX XX XX